

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
篡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
部分的滔天罪行

江西师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翻印

一九七七年九月

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篡改

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滔天罪行

华国锋主席指出：“深入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是一九七七年的中心任务。”“四人帮”为了推行其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施展林彪那一套“打着红旗造反，不易被人看穿”的反革命策略，要尽了阴谋诡计。在理论战线上他们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号，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肆意践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严重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确实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因此，华主席指示我们，对于“四人帮”，“还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彻底肃清他们在理论战线的流毒和影响。事关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任务艰巨而光荣，我们必须努力作战。

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的反动思想工具；但是“四人帮”却给它贴上辩证

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标签，颇有欺骗性，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哲学典型。他们接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的命题，肆意篡改，蓄意歪曲，大搞思想骗局。戳穿这个骗局，还“四人帮”的反革命哲学以本来面目，将有助于分清什么是唯物论和唯心论，什么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进一步认识“四人帮”一伙极右派的丑恶嘴脸和反动本质。

（一） 唯心主义横行

“四人帮”唯心主义横行，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他们打着辩证唯物论的旗号，以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辩证性质为借口，片面夸大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篡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宣扬主观唯心论，为其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1. 歪曲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鼓吹唯心主义的精神至上论

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是区别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基本问题。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两大阵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0页）凡是主张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精神决定物质的，都是唯心论。相反，凡是承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的，则属于唯物论阵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既不同于唯心论，主张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又区别于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承认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及其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

“四人帮”打着反对机械唯物论和形而上学唯条件论的旗号，采取夸大精神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手法，颠倒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鼓吹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用唯心主义的精神至上论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

姚文元早在1967年就公开攻击“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这个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胡说它“完全抹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决不是什么‘辩证唯物论’，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姚文元只“承认”主观能动性，反对“存在第一，思维第二”，这就证明他反对的根本不是形而上学，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立场。他所说的“主观能动性”的真实含义，就是精神决定物质。他在论证“美”的来源时说：“没有审美能力的主体，也就无所谓美丑之别”。很清楚，认为审美的主体决定美的客观内容，就是主张“主观第一，客观第二”，精神决定物质，是他的唯心主义精神至上论在美学上的应用。

“四人帮”还借口反对形而上学“唯条件论”攻击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大庆“两论”起家。英雄的大庆人根据“两论”精神，提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豪迈口号。这是一个既唯物又辩证、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结合的口号，“四人帮”却攻击它是“唯条件论”。大庆人的“三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严格要求，严密组织，严肃态度，严明纪律）作风，生动体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四人帮”却攻击它是“精神枷锁”，“提倡奴隶主义”。这就充分暴露了“四人帮”是“无条件论”者，鼓吹办事情可以为所欲为，不受客观条件所制约。在人民公社由三级所有制向两级所有过渡问题上，

“四人帮”竭力宣扬“物质基础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精神”，狂热鼓吹穷队要靠“穷精神”过渡，胡说“不够条件不能说不可以过渡”。这些胡言乱语，和林彪鼓吹的“精神可以代替物质”的谬论，完全是一个调子。这帮家伙好象是强调精神的反作用，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反对形而上学的唯条件论，实际却是把精神的能动作用片面夸大了，否认了物质对精神的制约作用。他们的“无条件论”就是精神至上论，在理论上是极其荒谬的，在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在政治上是极其反动的。他们宣扬精神至上论，实际是否认客观规律，鼓吹要干啥就干啥、要咋干就咋干、不受任何约束的主观随意性和无政府主义。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违背客观规律而遭到挫折和失败，以便他们篡党夺权，取而代之。其用心何其毒也！

2. 颠倒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鼓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毛主席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是主张从实践到认识，还是从认识到实践，这是唯物论和唯心论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毛主席概括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总公式。“四人帮”主张从认识到实践的唯心论的认识路线，是一伙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天才论的吹鼓手。狗头军师张春桥把毛主席关于认识论的总公式篡改为“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理论——实践——再上升为理论”，把认识说成是不依赖于实践、先于感性经验的东西。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公然背叛。文痞姚文元更是以“天才的灵童”自诩。他利用手中把

持的宣传工具，狂热宣扬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天才论，胡说七、八岁的儿童团“解决了国内外都在探讨的（科学）疑难问题”，鼓吹越年青越没有实践经验越聪明，实践经验越丰富反而越糊涂，越反动。他们公开叫嚣：“突出儿童团总比突出老头子强”。真是一语道破。他们如此狂热地鼓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天才论，就是妄图欺骗缺乏实践经验的青年，为他们打倒一大批革命老干部，篡党夺权买命。完全是托洛茨基那一套反革命伎俩，极其阴险毒辣。

孔老二是天才论的祖师爷，他还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到十五岁才立志于学习，没有什么成就，“客气”一下。“四人帮”却就胡诌七、八岁就不学而能，无师自通，比孔老二还要天才一倍。

“四人帮”宣扬先验论，反对实践论，突出表现在反对所谓经验主义问题上。他们打着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招牌，大反经验主义。江青到处叫喊：“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两次路线斗争的教训，不少人上当受骗，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如不很好地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能力，否则就会变修”。张春桥其势汹汹地叫喊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来抓。姚文元在其黑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中，蛊惑人心地“总结”了一条“深刻教训”，即“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

“四人帮”真是重视马列主义理论、反对经验主义吗？完全不是。第一，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意在反修防修；“四人帮”以重视理论学习为借口，把经验主义当作主要危险、“当作纲”来抓，目的是否认修正主义是主要危

险，转移人们的视线，以便他们放手大搞修正主义。第二，他们把革命实践经验当作经验主义，把具有丰富革命经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诬蔑为经验主义者加以反对，妄图取而代之。他们公开叫喊：“老头子都是经验主义”。“老干部是只凭老经验办事”的“经验主义者”，“只有民主革命的经验”，“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胸无大志，目光短浅”，“是革命的大敌。大敌当前，有打倒的必要”。尤其可恶的是，他们还把攻击经验主义的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他们利令智昏地叫嚣，“理论权威必然转化为组织上的权威”。意思是说：“我理论权威上台，你经验主义者下台，这是必然的。第三，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戳穿了他们贼喊捉贼的伎俩。“四人帮”的经验主义和彭德怀的经验主义一样，是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四人帮”那里，经验就是他们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不是来源于实践，而是主观自生的东西。这种主观唯心论的经验论和先验论没有什么两样。

3. 抹杀真理的客观性，宣扬实用主义的真理论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因此，它承认客观真理。毛主席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与此相反，“四人帮”从唯心主义经验论出发，必然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主张真理依他们的主观感觉而定。华主席深刻指出：

“四人帮”一伙“唯心主义横行。许多正确的东西被他们说成错误的，许多错误的东西被他们说成正确的”。这是对

“四人帮”实用主义真理论的反动本质的深刻批判。“四人帮”是反动买办文人胡适的忠实信徒，鼓吹对我有用的就是真理，就是新生事物、革命派。否则，就是错误，就是旧事物、反革命。明明是阿飞、流氓、现行反革命，对他们有用，就说“这样的青年可能有长处，打起来很勇敢，当解放军上前线，受重伤不下火线”。于是，封为“造反派”、“反潮流英雄”，“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对于反对他们的，你是年青的就给你戴上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大帽子，你是年老的，就打你民主派、走资派的大棍子，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他们是一伙假革命的反革命，却把自己说成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对的，没有半点错误。他们一会儿鼓吹读书无用论，说“宁可少读两本书，也别叫资产阶级熏染下一代”，一会儿又高唱读书作官论，说“将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从学校中培养”；他们一会儿把政治和业务对立起来，以政治代替业务，胡说“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时而又把政治和业务等同起来，以业务代替政治，说什么“服务工作本身就是政治工作”；他们有时根据需要攻击人家是“九斤老太”，有时又根据另一种需要叫喊“学生中没有一个是‘三好’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对待历史，“四人帮”更是严格按着胡适的实用主义“名言”行事：“历史实在是一个很顺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在批儒评法中，他们就是这样表演的。谁是儒家，谁是法家，谁进步，谁反动，封建制度何时确立，秦王朝又为何灾亡，等等，等等，完全以“四

人帮”的需要而定。

总之，在“四人帮”那里，真理不过是他们手中的一团泥，可以随心所欲地拉长、搓圆或捏扁，他们咋说、咋干都是真理，一贯正确，绝对正确，因此是批评不得的；而别人怎样也是不对的，因此只能去挨批评的角色。

“四人帮”的主观唯心主义精神至上论、先验论和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实质都是极端荒谬的“唯我论”。刘少奇自封为“刘克思”，林彪以“天马”自居，江青以“天公”自命。这些阴谋家、野心家在自我膨胀的时候，是少不了“唯我论”这个打气筒的。“四人帮”大搞以我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切以我为转移。“他们的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是一伙典型的“唯我论”者。据有人统计，江青在一次讲话中，竟用了一百多个“我”字。当然，膨胀过“度”，必然破灭。客观辩证法就是如此，“四人帮”岂能逃脱！

（二）形而上学猖獗

毛主席在批判“四人帮”时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深刻揭露了“四人帮”思想路线的反动实质和特点。“四人帮”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凶恶而又狡猾的敌人。形而上学是他们打棍子、扣帽子，篡党夺权的反动思想工具。“四人帮”反对唯物辩证法，大搞形而上学的一个基本手法是，挂着坚持对立统一规律、反对折中主义的招牌，贩卖绝对化、片面性和“一点论”等私货。

1. 反对“两点论”，大搞“一点论”

这是“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的突出表现之

一。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普遍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毛主席把对立统一规律通俗而又深刻地表述为“两点论”，指出，任何事物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在反对折中主义的口号下，大反“两点论”，大搞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一点论”。他们否认矛盾的普遍性，不准对任何事物作具体的“两点论”的分析。凡是他们认为好的，一切皆好，绝对肯定，凡是他们认为坏的，一切皆坏，绝对否定。

“对着干”，这是“四人帮”甚嚣一时的口号，什么“和十七年对着干”呀，“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呀，喊的震耳欲聋，听起来比谁都革命，仔细分析，却是反动的否定一切的“一点论”。不错，对于错误路线和错误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要否定的，问题是如何否定。有辩证法的“两点论”的否定，有形而上学“一点论”的否定。以教育战线为例，如何对待旧学校？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深刻指出，对于旧学校，是要坚决否定的，但是，“还要把旧学校中的坏东西同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区别开来。要善于从旧学校中挑选出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东西。”用不着多说，列宁对旧学校是持“两点论”的分析态度的。“四人帮”的“对着干”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看一下他们是怎样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你修正主义搞“智育第一”；是错误的，和你“对着干”，他就否定一切智育；你搞“读书作官”，他就鼓吹读书无用；你搞分数挂帅，他就否定一切考试；你搞脱离实际的基础理论教育，他

就取消基础理论；你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他就把教师统统打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行列，叫你“臭老九”，当作专政对象，直至“踢开教师闹革命”，创造一个取消教师、由学生自治的“典型”学校推广全国，并美其名曰对旧传统、旧事物的“彻底批判和与之彻底决裂”。取消了教师，还可以有学生，还可以叫学校？！他们形而上学猖獗到何种程度。列宁说沙俄遗留下来的旧学校还有“两点”，毛主席说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外国都有“两点”，难道我们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主义事就只有“一点”，没有“两点”？天下那有这种道理！

尽管天下没有这种道理，“四人帮”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一点论”的“对着干”，却四处泛滥，疯狂一时。例如：你搞“专家路线”，他就否定一切专家；你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他就否定利润，不要积累，不管人民死活；你搞“管、卡、压”，他就否定一切规章制度；你搞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扩大差别，他就完全否定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鼓吹平均主义；直至你搞“唯生产力论”，他就否定生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看来他们似乎是恨透了修正主义路线，恨透了旧制度、旧学校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正好相反，他们恨的和全盘否定的正是包括教育事业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四人帮”的大量罪行证明，如果按照他们的“对着干”行事，对智育、知识分子、专家、规章制度、利润、积累、按劳分配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四个现代化……等等，统统取消，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将会造成什么样的恶果，不是一清二楚的吗？他们那里是“和修正主义对着干”，分明是打着“和修正主义对着干”

的幌子和全国人民对着干，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和马克思主义对着干；那里是什么辩证法，纯粹是假革命的反革命哲学。

他们不仅叫嚣“和十七年对着干”，全盘否定十七年在毛主席领导下，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而且对整个民主革命也持否定一切的“一点论”态度。在他们看来，民主革命不仅无用，反而有害。所以他们狂叫，中国的“历史要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是说过去的全不算数，必须推倒重来，用张春桥的话说，就是“改朝换代”。意思很清楚，就是要由他们的“帮天下”取代无产阶级的江山。

他们全盘否定民主革命和十七年的一个重要罪恶目的，就是全盘否定和打倒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肆意攻击这些老同志“只有民主革命经验”，“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经验”，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当年的民主派，就是今天的走资派”。狂叫“现在革命的对象，就是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要从组织上动大手术”。反革命气焰不可一世。革命导师列宁在揭露机会主义者的“谎话”时深刻指出：他们“否定修正主义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324页）。“四人帮”的和“修正主义对着干”，正是为了掩饰和推行他们自己的修正主义。

“四人帮”是新生事物的死敌。但是他们却把自己打扮成新生事物的热情支持者，主要手法就是大搞肯定一切的“一点论”。新生事物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利益的需要，具有强大生命力。但是，在其开始阶段，往往是不完善

的，需要培育。如教育革命、赤脚医生和革命现代戏等等，都是如此。“四人帮”一方面为了把自己打扮成“左派”，另一方面又是为了扼杀新生事物，他们玩弄肯定一切的手法，不准革命人民为完善新生事物提出任何改进意见。谁要提点意见，他们就火冒三丈，摆出“护法尊神”的架势，祭起“反对新生事物”的“法宝”向你砸来。形式上看似乎是满腔热情地维护新生事物，实际却是掩盖新生事物的不完善之处。他们妄图用这种手法，使新生事物不完善之处得不到及时改进，从而使新生事物遭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不能正常地、健康地成长。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捧杀”，它比“骂杀”更为阴险狠毒。

至于“四人帮”对他们自己，则和叛徒、卖国贼王明完成一样，更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肯定一切，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十分完美，没有丝毫缺陷。似乎上帝把人类一切美德都集中于他们一帮一伙身上，别人根本没有那个“福气”只好等待着被全盘否定的命运。

“四人帮”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形式相反，实质一样，都是利而上学的“一点论”，都是向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82页）。他们对自己肯定一切，最后被否定的正是他们一帮。他们对无产阶级否定一切，结果，胜利仍就是无产阶级的。

2. 用形而上学的“一点论”篡改辩证法的“重点论”
辩证法既是“两点论”，认为事物就是矛盾，都有两点，又是“重点论”，承认矛盾和矛盾的双方有主有次，反对折中主义和均衡论。“四人帮”打着反对折中主义、均衡

论的旗号，用形而上学“一点论”，冒充、歪曲辩证法的“重点论”。他们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对立起来，用主要矛盾否认次要矛盾，用矛盾的主要方面否认矛盾的次要方面，即用所谓的“重点”否定非重点，反对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反对突出重点，照顾一般，如被“四人帮”搞得最乱的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革命与生产的关系问题，毛主席早就精辟地指出：“**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毛主席又说：“**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这里既讲了政治的统帅作用，也讲了政治的保证作用，既是“重点论”，又是“两点论”。“四人帮”出于反革命需要，蓄意制造混乱，把“重点论”歪曲为“一点论”，鼓吹“只要抓好了阶级斗争”，“革命搞好了，生产下降也可以”，“工厂可以不出产品”，“农场颗粒无收也不要紧”，甚至叫喊“路线正确，不出煤也要开庆功大会”。这是说，重点就是一切，可以排斥一切、代替一切。在红与专、领导与群众、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以及其它一切矛盾问题上，“四人帮”都是如此，借口抓重点，以一方面否定另一方面。谁要主张抓纲必须带目、抓革命必须促生产、抓重点必须照顾一般，就被斥责为搞“折中”，“均衡论”，“唯生产力论”，“以生产压革命”，等等。他们这一套实在不得人心。群众都了解，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生产一塌糊涂，怎能说革命搞好了？怎能说路线正确？怎能说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重点与一般、主与次，既对立，又统一，失去一方，他方怎么能存在？正如没有兵就无所谓

“帅”一样，没有目也就无所谓纲，没有业务也就无所谓政治。所以“四人帮”叫喊的“政治挂帅”的“帅”，因为它否定业务，不过是没有兵的“光杆司令”而已。

唯物辩证法认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固定的、永远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伟大导师列宁指出：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中，“可以看到唯物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的本领。”（《列宁选集》第一卷第693页）列宁也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光辉典范。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明确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是说，在不同时期，根据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心任务或工作重点，是可以而且必然要转化的。在《矛盾论》中，毛主席还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指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然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打开《毛泽东选集》，关于党的中心任务、工作重点随着情况的变化而转化的论述，比比皆是。如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

“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又说：北方的情况不同于南方，“在这里，已经推翻

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人民的统治，并且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同时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巩固整个北方，支援人民解放军。”当然，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在任何时期，不管中心任务、工作重点如何改变，“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这一点是不变的。通俗点说，就是干什么工作都要有一个方向、路线问题，有一个指导思想问题。“四人帮”否认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可以转化，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绝对化，变成在任何条件下都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否认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一般地处于主要方面。鼓吹党的中心任务永远不变的谬论。

“四人帮”用形而上学“一点论”篡改“重点论”，看起来似乎是抓“重点”，其实却是借抓重点之名，行否定重点之实。因为他们既然否定了非重点，他们的所谓“重点”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任务，就永远排不上号，上不了马，从而也就永远不能从根本上战胜资本主义。

3. 割裂共性与个性的联结

毛主席指出：“共性个性……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矛盾的共性与个性，即普遍性与特殊性，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结，构成一对矛盾。任何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矛盾统一体。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不能脱离个性而存在。辩证法的“两点论”要求，既要看到共性，了解事物的普遍规律和共同本质，又要把握个性，掌握事物的特殊

规律和特殊本质。两个方面不能割裂。这就要求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具体实践相结合。

从第二国际的伯恩施坦一伙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惯用手法是，打着具体分析的幌子，夸大个性，否定共性，割裂两者的联结。他们借口各国情况特殊和历史条件的新变化，否定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这是一种类型的“一点论”。“四人帮”也使用这一手。那个所谓“张春桥思想”和“第四个里程碑”的反革命狂想曲，就是用这个调门演奏的。毛主席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有一系列重要指示，胜利地指导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的伟大贡献。张春桥却借口什么“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新变化”，叫嚣读了“毛选”四卷“越读越感到自己对今天各阶级的具体情况真是不甚了了”，“需要具体地研究一九六六年以后的阶级关系”，公然诬蔑毛泽东思想“过时了”，明目张胆地叫嚷要由他写一本《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分析》，“作为今后制定政策的依据”。这是“四人帮”全面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暴露。

“四人帮”是实用主义者、变色龙。根据其反革命需要，他们还采取相反手法，即夸大共性，否定个性，从另一个方面破坏共性与个性的联结。他们为破坏教育革命和科技革命，取消基础理论，矢口否认自然科学有自己的特殊的基础理论。姚文元胡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自然科学最基础的理论”，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方法论代替自然科学本身所特有的基础理论。这是用共性代替个性的典型一